

# 西方新民粹主义的政治传播策略探析\*

刘文科

**内容提要** 新民粹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欧美发达国家迅速兴起、21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发展的一种民族政治思潮和运动。新民粹主义对现代民族—国家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产生的重大影响,使其成为近年来民族政治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本文以政治传播为视角,深入分析新民粹主义的威权组织传播策略、有效运用媒体逻辑和社交媒体的媒体传播策略、反传统的政治修辞策略等政治传播策略,尝试说明近年来民粹主义是如何逐步演变为新民粹主义的,从而更深刻地认识西方新民粹主义迅速兴起和加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新民粹主义 威权组织传播策略 媒体传播策略 反传统政治修辞策略

##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民粹主义<sup>①</sup>在西方发达国家不断泛滥并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发展,使世界民族问题日益复杂化,世界经济政治发展面临更多新风险、新挑战,民族—国家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由此成为21世纪以来西方民族政治研究和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sup>②</sup>基于新民粹主义的全球影响力,我国学者同样关注相关问题的研究。新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的密切关联,使其首先成为我国民族学研究的重要范畴。有学者指出,欧美国家近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潮流、“国家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等,都与新民粹主义的强势崛起不无关系。<sup>③</sup>还有许多学者认为,新民粹主义已成为西方社会的“新常态”,成为搅乱世界秩序的结构难题。<sup>④</sup>同时,由于新民粹主义常常在西方选举政治中崛起,由此也成为我国西方政治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许多学者认为,西方新民粹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文化危机、制度危机、治理危机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产物,是经济衰退、政治腐败、文化冲突、社会身份冲突等多

\* 本文为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政治传播视角下‘台独’逆流演变与遏制对策研究”(21BZZ08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特别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审稿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在国内外相关研究中,针对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泛滥于21世纪的欧美第四波民粹主义,有学者采用“新民粹主义”概念,有学者采用“右翼民粹主义”概念。本文根据相关学术研究的的发展趋势,采用“新民粹主义”来指称欧美第四波民粹主义。

② Benjamin Moffitt, *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erformance, Political Style and Representatio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aul Taggart, Paulina Ochoa Espejo, Pierre Ostigu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pu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

③ 参见刘泓:《以“逆全球化”应对难民危机不是明智之选》,载《人民论坛》,2018年第28期;《欧美“国家种族主义”现端倪》,载《人民论坛》,2019年第1期;《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2019年的实践》,载《人民论坛》,2019年第35期;《全球化与民族分裂主义》,载《人民论坛》,2020年第S1期。

④ 参见严庆、平维彬:《冲突与动荡:以人民的名义——新一波民粹主义对当前世界民族问题的影响》,载《世界民族》,2019年第5期;石立春、杨雨林:《21世纪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发展态势与规律研究》,载《世界民族》,2021年第1期;罗圣荣、赵祺、张新:《新冠疫情下疫苗民族主义的缘起、表现及其影响》,载《世界民族》,2021年第5期。

种因素发生综合作用的结果。<sup>①</sup>

在民族政治研究的基本框架下,因政治传播技术的进步而使新民粹主义拥有非传统的政治传播策略,同样成为中外学者的研究重点。毕竟,“政治思潮的发生、发展离不开传播,没有传播就没有政治思潮。”<sup>②</sup>特别是“近年来的成功中,新民粹主义运用的传播策略和占用的媒体空间不可小觑”,“他们获得的不成比例的成功,正是他们在媒体上获得过多报道的结果。”<sup>③</sup>所以,许多学者试图从政治传播策略的视角,解释新民粹主义为什么能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兴起并加速发展,形成了有关新民粹主义的“政治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理论、“政治策略(political strategic)”理论、“政治风格(political style)”理论、<sup>④</sup>“做政治(doing politics)”理论<sup>⑤</sup>等。不过,多数学者是在进行国别研究和分析时才会涉及新民粹主义政治传播策略的某些方面,很少从该视角展开一般性的系统理论分析。深入研判相关政治现象,就会发现,非传统的政治传播策略的运用始终伴随着新民粹主义兴起与发展的全过程。如果没有这些政治传播策略的运用,新民粹主义或许难以迅速兴起并加速发展。

## 二、新民粹主义的威权组织传播策略

一般来说,围绕具有突出个人特质的政治领袖传播政治理念并组织政治运动,是新民粹主义采用的比较普遍的威权式组织传播策略。其中,具有突出个人特质的政治领袖构成了组织核心,他们“通过自上而下的领导机制联系他们的追随者,发挥他们的影响力,行使他们的权力”,<sup>⑥</sup>以传播新民粹主义的政治理念,发起或推进新民粹主义政治思潮和运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没有政党,新民粹主义可以存在,没有运动,新民粹主义同样可以存在,但如果没有政治领袖,很难想象新民粹主义还能存在。<sup>⑦</sup>这充分说明了政治领袖在新民粹主义政治活动中的核心地位。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既是“人民”的动员者、组织者和领导人,又是新民粹主义政治理念的“发言人”。“他们拥有出色的公共演说技巧,有时还具备‘媒体宠儿’的个性特征,能够十分精明地获得人气和媒体注意力。他们擅长使用高度情绪化的、口号式的、易引起轰动效应的语言,并采用当代政治营销手段把语言上的极端主义与符号政治结合起来,在选民中间传播他们的理念。”<sup>⑧</sup>他们常常是非道德的政治角色,不受既有政治道德和政治规范的约束,敢于打破“政治禁忌”,很容易塑造出引发争议的领导人形象。正是政治领袖这些突出的个人特质,使新民粹主义在传播政治理念和组织政治运动时以威权主义的形式获得广泛的政治影响力。

那么,具有突出个人特质的政治领袖是如何完成政治理念传播并组织政治运动的呢?近年来,比较有影响的“政治风格”理论完整地探讨了新民粹主义的组织传播过程。该理论认为,政

① 参见符妹、李振:《欧洲新民粹主义的资本主义属性及其内在悖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韩海涛:《欧美新民粹主义思潮的主要特征与发展趋势探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高春芽:《政党代表性危机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载《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佟德志、朱炳坤:《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及原因分析》,载《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② 王炳权:《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41页。

③ Ruth Wodak, Majid Khosravini, Brigitte Mr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e: Politics and Discourse*,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an imprint of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13, p. xvii.

④ Benjamin Moffitt, *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erformance, Political Style and Representation*, pp. 25–26.

⑤ Michael Kranert, Geraldine Horan, *Doing Politics: Discursivity, Performativity and Mediation in Political Discours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9, p. 153.

⑥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aul Taggart, Paulina Ochoa Espejo, Pierre Ostigu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pulism*, pp. 55–56.

⑦ Benjamin Moffitt, *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erformance, Political Style and Representation*, p. 55.

⑧ Gianpietro Mazzoleni, Julianne Stewart, Bruce Horsfield, *The Media and Neo-Populism: A Contemporary Comparative Analysis*,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3, p. 5.

治表演是新民粹主义的共同传播手段。其中,政治领袖是政治表演的“关键角色”;媒体场域是政治表演的舞台;“人民”VS“精英”是政治表演的“台词”;“不体面方式”是政治表演的呈现手段;受众则是表演者心目中叫作“人民”的追随者。<sup>①</sup>于是,新民粹主义成功的关键,是拥有高超表演能力的政治领袖,能够通过非制度化的政治表演把无组织的追随者团结起来。

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进行政治表演的主要步骤,就是传播“人民”与“精英”对立的政治理念,以“反建制”“反精英”等极端政治言论出场,吸引媒体与公众的注意力,这是他们通过政治理念传播克服体制内组织力量薄弱的不二法门。新民粹主义运用“人民”与“精英”二元对立的政治理念,展现出他们最根本的世界观。在新民粹主义看来,“政治世界就是普通民众的意志与罪恶的、充满阴谋的精英意志之间进行着摩尼教式(善恶对立)斗争的世界”<sup>②</sup>。其中,“人民”与“精英”都是同质的共同体,“人民”是同质的道德高尚的共同体,“精英”是同质的自私自利的共同体,<sup>③</sup>人民与精英之间是對抗性异质关系,<sup>④</sup>人民对罪恶的精英充满着仇恨。于是,新民粹主义常常诉诸“人民”来证明其政治要求和政治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sup>⑤</sup>新民粹主义认为,人民是权力的终极来源,是“主权者”,政治应当反映“人民的意志”,民主应当是人民的直接统治,而代议制民主却阻止了人民的直接统治。<sup>⑥</sup>尤其是当代的代议制民主出现了“代表性危机”,<sup>⑦</sup>人民“看到他们的代表已经不能按照他们通过选票、抗议活动或者其他动员形式发出的讯息来代表他们”,“腐败、政治丑闻、缺乏政治透明度”已经使代议制民主丧失了代表功能。<sup>⑧</sup>所以,新民粹主义主张把权力还给人民,建立起“不需要政党、议会等中介机制”的直接民主制。<sup>⑨</sup>其中,“民粹主义者是让人民满意的唯一真正代表”,<sup>⑩</sup>“他们且仅有他们能代表人民”<sup>⑪</sup>。这样,通过对“人民”与“精英”政治理念进行二元对立的、简单化的、极端化的传播,新民粹主义极易获得其政治合法性。

同时,新民粹主义常常建构起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积极身份,即“我们人民”<sup>⑫</sup>。在不同的政治传播情景中,“我们人民”可以具体化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我们”“每个人”,或“以部分代表整体”的“工人阶级”“每个家庭”等政治话语。<sup>⑬</sup>与“我们人民”对立的就是人民的“敌人”,是“他们”,“他们”可能是“腐败的不负责任的精英”“建制派”“欧盟”“华尔街银行家”“主流媒体”“外国人”“非法移民”“穆斯林”“黑人”“亚裔”,等等。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新民粹主义常常与“平民主义”“种族主义”“本土主义”“排外主义”等狭隘的政治理念密切相关,建构

① Benjamin Moffitt, *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erformance, Political Style and Representation*, p. 55.

② Kirk A. Hawkins, Ryan E. Carlin, Levente Littvay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The Ideational Approach to Populism: Concept, Theory, and Analysis*,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 3.

③ Mats Ekström, Julie Firmstone, *The Mediated Politics of Europ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scourse*,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291.

④ 林红:《西方民粹主义的话语政治及其面临的批判》,载《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4期。

⑤ 严庆、平维彬:《冲突与动荡:以人民的名义——新一波民粹主义对当前世界民族问题的影响》,载《世界民族》,2019年第5期。

⑥ Ruth Wodak, Majid Khosravinik, Brigitte Mr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e: Politics and Discourse*, p. 3.

⑦ 高春芽:《政党代表性危机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载《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

⑧ Benjamin Moffitt, *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erformance, Political Style and Representation*, p. 144.

⑨ Hanspeter Kriesi,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Direct Democratic Campaigns: Enlightening or Manipulatin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 17-18.

⑩ Mats Ekström, Julie Firmstone, *The Mediated Politics of Europ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scourse*, p. 291.

⑪ [德]扬一维尔纳·米勒著,钱静远译:《什么是民粹主义?》,译林出版社,2020年,第25页。

⑫ 这一源于美国宪法的现代政治修辞常常被新民粹主义者所采用,以显示出新民粹主义政治思潮和运动的民主性与合法性。

⑬ Kirk A. Hawkins, Ryan E. Carlin, Levente Littvay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The Ideational Approach to Populism: Concept, Theory, and Analysis*, p. 53.

出一种身份政治。<sup>①</sup>

新民粹主义运用的各种政治理念,构成了新民粹主义政治思潮和运动满满的“理念工具箱”,可以在不同的政治传播情景中随时拿出来使用。不过,许多学者指出,新民粹主义的“人民”概念具有模糊性,“谁是人民”常常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这导致新民粹主义的“理念工具箱”常常是“一个充满各种信仰、成见、态度和规划”的杂物收集箱,“旨在动员同样充满矛盾的各种选民群体”。<sup>②</sup>正是通过这种政治理念的“模糊”传播策略,他们常常能够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达到先声夺人的目的。当新民粹主义者在政治传播过程中诉诸各种政治理念而不是建构某种完备的思想体系时,他们就深刻地认识到,完备的思想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后现代的政治传播情境,难以收到即时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传播效果,难以在短时间内掀起狂潮般的民众支持。在人人都是受众和传播者的信息时代,二元对立、简单化、极端化的政治理念传播,既能满足人们对即时讯息的需求和好奇心,让人感觉印象深刻,又能让人们产生满满的参与感和存在感。而且“理念可以毫不费力地迅速穿越国家的边界”,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sup>③</sup>这样,当新民粹主义针对某种具体情景或具体问题从“理念工具箱”中拿出“纯洁的人民”“腐败的精英”“固化的建制派”“讨厌的外国移民”等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政治理念时,很容易在人们中间形成共鸣、达成共识、付诸行动,这正是新民粹主义常常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民众支持并成功发起政治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作为新民粹主义政治表演者,政治领袖在传播政治理念时常常面临比较艰难的困境,他们必须扮演好“普通人”与“杰出人物”的双重角色,并为其追随者所接受。几乎所有的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都会针对其政治理念中的“人民”群体采用“不体面(Bad Manners)”的政治语言风格,以对应精英或官僚“体面(Good Manners)”的政治语言风格。<sup>④</sup>他们常常使用语出惊人的“粗言秽语”“政治不正确”或者其他鄙视“体面”政治的方式展示自己,通过诅咒、谩骂或荒谬的主张降低自己的政治话语“水平”和政治身份。比如法国国民阵线创始人让·玛丽·勒庞把政治对手斥为“恋童癖者”;意大利力量党创始人贝卢斯科尼曾想把党的名称改为“小姐加油”<sup>⑤</sup>;美国“茶党”的佩林总结出“新民粹主义理论就是‘Screw the political correctness(去他的政治正确)’”,<sup>⑥</sup>美国前总统特朗普<sup>⑦</sup>公开指出“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正确”,并在竞选中发动了一场反对政治正确的全面战争,“历史性地颠覆了政治正确与选民投票倾向之间的关系”<sup>⑧</sup>等,都是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不体面”的政治语言风格的具体表现。通过这种语出惊人的“不体面方式”,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很容易把自己与“精英”和“建制派”区别开来,建构出自己“平民”

① 参见刘泓:《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2019年的实践》,载《人民论坛》,2019年第35期;石立春、杨雨林:《21世纪欧洲右翼新民粹主义思潮的发展态势与规律研究》,载《世界民族》,2021年第1期;马正义:《新冠疫情中欧美国家的种族歧视与排外行为》,载《世界民族》,2020年第5期;陈筠涛:《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美国族群政治——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美国华裔身份政治的实践及困境》,载《世界民族》,2022年第3期;Ruth Wodak, Majid Khosravinik, Brigitte Mr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e: Politics and Discourse*, pp. 4-9.

② Ruth Wodak, Majid Khosravinik, Brigitte Mr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e: Politics and Discourse*, p. xviii.

③ Ruth Wodak, Majid Khosravinik, Brigitte Mr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e: Politics and Discourse*, p. 55.

④ Benjamin Moffitt, *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erformance, Political Style and Representation*, p. 46.

⑤ 意大利力量党的名称为“*Forza Italia*”,来源于意大利球迷为自己球队助威时的一句口号,原意是“意大利,加油”。贝卢斯科尼指望一个“更加草根化”的名字能提升党派的亲和力,就想把它改成“*Forza Gnocca*”,意为“小姐加油”。

⑥ Benjamin Moffitt, *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erformance, Political Style and Representation*, pp. 57-65.

⑦ 从政治立场上来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准确地说他更应该属于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建制派,他只是利用了美国的新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或者说与新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形成了某种合作。尽管如此,特朗普的政治传播行为和策略完全是新民粹主义式的,因此本文把特朗普与其他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放在一起进行讨论。

⑧ 祁玲玲:《选举政治的逻辑——美国反政治正确的归因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

和“人民的一员”的社会政治身份,成为吸引普通民众注意力的利器,并获得普通民众的欢呼与喝彩、认同与支持。

但是,通过“不体面方式”扮演“普通人”只是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争取普通民众支持的一方面,他们还必须扮演好“杰出人物”,甚至扮演成“人民的救世主”。不然,他们凭什么领导“人民”并让“人民”团结在他们周围呢?他们常常宣称,只有他们能够理解“人民”在想什么,能够说明“人民”的需求与愿望。比如,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发表提名演说时就说:“我是‘美国人民的声音’”,是“我们国家被遗忘的男人和女人的声音”。<sup>①</sup>他们还常常展现自己是能够解决“人民的”问题的非凡人物,他们身上拥有神圣光环。比如贝卢斯科尼宣称:“我是政治上的耶稣基督,是病态社会的牺牲者,与每个人同在,我为大家牺牲自己。”<sup>②</sup>于是,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把其政治领导行为与救世诉求、宗教仪式、神秘感和千年太平联系起来,建构出一种“使命政治”,他们不仅代表“人民”,领导“人民”,而且还是“人民”的化身。他们的强大、精力充沛和身体健康,是强大而团结的“人民”的展现。这样,通过扮演“杰出人物”的身份,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就在“普通人”的身份之上形成自己“一呼百应”的政治权威。

总之,在组织力量比较薄弱的情况下,采用“人民”与“精英”对立的核心理念,以极端的政治言论出场,采用“不体面”的政治语言风格建构自己的“平民”身份,并建构自己的“杰出人物”身份形成领导“人民”的政治权威,就成为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获取和扩大政治影响力的威权式组织传播策略。

### 三、新民粹主义有效运用媒体逻辑和社交媒体的媒体传播策略

在西方后现代社会,媒体对政治领域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以及政治对媒体依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政治媒体化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sup>③</sup>媒体不再仅仅是政治信息的传播载体,而是日益成为政治活动的舞台。<sup>④</sup>公共领域的媒体化、政治决策的媒体化、政治治理的媒体化、政治监督的媒体化、政治运动的媒体化等,都是政治媒体化的具体表现。尤其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的兴起,不断加速西方国家的政治媒体化进程,选举政治、政党政治、代议政治都在朝着媒体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媒体在西方国家政治过程中的地位已经不再是“第四权力”所能概括的,而是成为几乎超越全部传统政治权力之上的权力,“是政治和公共生活得以展开的场所”<sup>⑤</sup>。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媒体场域获取政治权力或影响政治过程,就成为多数政治人物或政治组织的必然选择。作为新兴政治力量,新民粹主义也不例外。而且,新民粹主义能够通过吸引社会公众的注意力取得传统政治力量难以取得的成功,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媒体逻辑以及新媒体的有效利用上。

首先,充分利用媒体逻辑吸引社会公众的注意力以获得更多报道,提高社会知名度,扩大政治影响力,是新民粹主义最重要的媒体策略。政治传播的媒体逻辑表明:“当某些问题、主题和事件被新闻记者认为符合新闻机构的新闻价值体系而具有新闻价值时才会得到报道”;“新奇

<sup>①</sup> Kirk A. Hawkins, Ryan E. Carlin, Levente Littvay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The Ideational Approach to Populism: Concept, Theory, and Analysis*, p. 365.

<sup>②</sup> Benjamin Moffitt, *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erformance, Political Style and Representation*, p. 63.

<sup>③</sup> 王琛元:《欧洲传播研究的“媒介化”转向:概念、路径与启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5期。

<sup>④</sup> Peter Van Aelst, Stefaan Walgrave, *How Political Actors Use the Media: A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Media's Role in Politics*,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2017, p. 8.

<sup>⑤</sup> Neil Washbourne, *Mediating Politics: Newspapers, Radio, Television and the Internet*,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

性、戏剧性、故事角色的重要性、典型性、时效性、受影响的民众范围、冲突性”则是主要的新闻价值标准。为了获得更多的受众和广告收入,新闻记者更倾向于报道具有轰动效应的事件、丑闻、犯罪和性故事。<sup>①</sup>很明显,新民粹主义有关“人民”与“精英”对立的核心理念,“反精英”“反建制”的政治立场,情绪化的“仇恨政治”,政治领袖“不体面”的政治语言风格以及其他个人特质,大规模的新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常常会因为具有新闻价值而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能够使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提高社会知名度并扩大政治影响力。美国2016年大选中的候选人桑德斯指责媒体时说:“对于企业媒体,美国人民面临的真正问题无关紧要……谩骂和人身攻击更容易获得报道,而且媒体喜欢报道。”特朗普则说:“我采用媒体利用我的方式利用媒体,都是为了吸引公众注意力……所以我有时进行粗暴的评论,给他们提供他们想要的——观众与读者——大家都是为了得分……我与媒体之间就是相互图利的关系,我们给彼此所需要的。”<sup>②</sup>事实上,自奥地利的海德尔开始,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以及他们领导下的政党,包括法国的勒庞及其国民阵线,意大利的博斯及其北方联盟、贝卢斯科尼及其力量党、格里洛及其五星运动党,澳大利亚的汉森及其单一民族党等,几乎都是利用媒体逻辑使他们在各自国家甚至全球范围内获得了较高知名度,扩大了政治影响力。

不过,新民粹主义利用媒体逻辑提高社会知名度和扩大影响力时,受媒体生态的制约,并非没有曲折。在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受国内文化和政治氛围的影响,都会存在两种主要的媒体类型:精英媒体和通俗媒体。精英媒体更倾向于维护现存政治秩序,支持主流政党和政府;努力表现出不带偏见、公平和负责任地进行新闻报道;不会为了发行率或收视率而主动争取大众受众,对新民粹主义的政治诉求很少积极反映。通俗媒体,比如脱口秀、通俗小报、娱乐性电视新闻和时事节目等,则更倾向于支持反对现存政治秩序的新民粹主义政治运动;注重报道政治领袖的个人特质,注重新闻故事的娱乐价值或冲突细节;经常传播小道消息,而很少对问题进行严肃分析;为了发行率或收视率会主动争取大众受众。<sup>③</sup>在这种媒体生态中,新民粹主义把精英媒体视为“人民的敌人”,精英媒体对新民粹主义则抱着或明或暗的敌视态度。特朗普把美国主流媒体斥责为“假新闻”及其与美国主流媒体之间相互敌视的态度,就是新民粹主义与精英媒体互为“敌人”的真实反映和集中表现。因此,在利用媒体逻辑提高社会知名度和扩大政治影响力时,新民粹主义经常遇到精英媒体的阻碍。尽管精英媒体可能会遵循媒体逻辑主动报道新民粹主义政治事件,“但多是进行惩罚性的负面报道,以破坏新民粹主义获取公众注意和政治合法性的努力。”<sup>④</sup>更多的时候,精英媒体对新民粹主义采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做法。不过,新民粹主义常常能够“迫使”精英媒体增加对他们的报道。当精英媒体对他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时,他们所具有的新闻价值一般会使其成为通俗媒体的报道对象,并形成“电视民粹主义”和“网红民粹主义”等新民粹主义的重要形态——媒体民粹主义。<sup>⑤</sup>这种媒体民粹主义往往会对精英媒体构成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冲击或威胁。由于担心受众和政治影响力的流失,精英媒体不得不借鉴通俗媒体的做法给予新民粹主义一定程度的报道,某些

① Gianpietro Mazzoleni, Julianne Stewart, Bruce Horsfield, *The Media and Neo-Populism: A Contemporary Comparative Analysis*, p. 12.

②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Demagogue: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rump and Twitter*, London: Pluto Press, 2018, pp. 172 - 173.

③ Gianpietro Mazzoleni, Julianne Stewart, Bruce Horsfield, *The Media and Neo-Populism: A Contemporary Comparative Analysis*, p. 8.

④ Gianpietro Mazzoleni, Julianne Stewart, Bruce Horsfield, *The Media and Neo-Populism: A Contemporary Comparative Analysis*, p. 219.

⑤ Manuel Anselmi, *Populism: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p. 83 - 86.

时候还会出现精英媒体的“通俗化”。于是,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无论是得到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新民粹主义往往能够通过精英媒体或通俗媒体的新闻报道,达到做免费政治广告的目的。特朗普曾说:“《纽约时报》的整版广告价格会超过10万美元,但他们报道我的某种行为时,不用花一分钱,我就能获得重要的宣传……不过,有趣的是,媒体对我进行批评性报道是彼此获得公众注意力的最佳方式。”<sup>①</sup>

其次,新民粹主义充分利用新媒体来实现传统政治力量难以实现的政治目的,包括组织政治运动和组成政党。近20年来,以WEB 2.0为基础的博客(Blog)、脸书(Facebook)、油管(YouTube)、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传播活动发生了重大变革。<sup>②</sup>与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不仅是影响公共舆论的政治信息传播渠道,而且还成为组织政治运动的重要渠道,发挥着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政治组织功能。2011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社交媒体同时发挥政治传播和政治组织功能的生动体现。在新民粹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传播政治理念,还是组织政治运动,社交媒体都发挥着关键作用。近20年来的经验表明,社交媒体常常是新民粹主义动员和组织“人民”的最好渠道。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常常通过社交媒体动员和组织“人民”,尝试实行自下而上的直接参与民主,并实现政治权力的合法化,被学者称为“民粹主义的2.0版”。<sup>③</sup>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不仅充分利用社交媒体传播政治理念和组织政治运动,甚至还以社交媒体为组织平台组成政党,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意大利的喜剧明星格里洛通过自己的博客建立了五星运动党。目前,五星运动党既是意大利最大政党,也是世界范围内以社交媒体起家的最成功的新民粹主义政党。无论是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政治理念,还是组织政治运动或组成政党,都表明社交媒体在新民粹主义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也反映出新民粹主义政治传播媒体策略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灵活性。<sup>④</sup>

当然,充分利用媒体逻辑和社交媒体传播政治理念和组织政治运动,只是新民粹主义政治传播比较普遍的媒体策略,在不同国家,不同的新民粹主义政治力量还采用许多其他形式的媒体策略。比如,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通过垄断大众媒体的方法成为近几十年来意大利执政时间最长且最具政治影响力的总理;特朗普在任职总统之前通过主持NBC真人秀节目《学徒》提高了社会知名度,并在任职总统之后创造出“推特治国”的民粹主义国家治理方式,这些都是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所采用的重要媒体策略,深刻说明了“媒体在新民粹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sup>⑤</sup>。

#### 四、新民粹主义的反传统政治修辞策略

几乎所有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民粹主义的学术理论,都认识到新民粹主义是一股采取反传统政治修辞的政治力量。<sup>⑥</sup>在西方政治传统中,政治修辞是政治主体运用政治语言实现政治说服的技术和能力,是政治权力合法化的必要途径。人品、理性和情绪是政治修辞的三大论据,

①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Demagogue: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rump and Twitter*, pp. 172 - 173.

② Glenn W. Richardson Jr.,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s: A New Way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Vol. 1)*, Santa Barbara: Praeger, 2017, p. vii.

③ Daniel Trotter, Christian Fuchs, *Social Media, Politics and the State: Protests, Revolutions, Riots, Crime and Policing in the Age of Facebook, Twitter and YouTube*,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 68.

④ 严庆、平维彬:《冲突与动荡:以人民的名义——新一波民粹主义对当前世界民族问题的影响》,载《世界民族》,2019年第5期。

⑤ Gianpietro Mazzoleni, Julianne Stewart, Bruce Horsfield, *The Media and Neo-Populism: A Contemporary Comparative Analysis*, p. 6.

⑥ Kirk A. Hawkins, Ryan E. Carlin, Levente Littvay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The Ideational Approach to Populism: Concept, Theory, and Analysis*, p. 2.

是实现政治说服的重要基础。人品是指政治修辞者必须具备正确的判断力、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意愿,是具有可信性的“好人”。理性是指政治修辞者传达符合事物本质和事物发展规律的理性政治信息,要“讲道理”并“讲清道理”。情绪是指政治修辞者使受众在情感上产生善意的情感共鸣。<sup>①</sup>然而,新民粹主义完全颠覆了西方政治修辞传统:极端主义者、充满偏见和歧视的人代替了具有正确判断力、高尚道德情操和良好意愿的“好人”;不用“讲清道理”的“常识”和“简单真理”代替了理性政治信息;煽动对立与仇恨代替了善意的情感共鸣。这些违背西方政治修辞传统的行为,正是新民粹主义政治传播中的反传统修辞策略。

从人品论据来看,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多是政治上的极端主义者、充满偏见和歧视的人,他们的语言和行为往往令人错愕。比如奥地利的海德尔、法国的勒庞、澳大利亚的汉森、荷兰的威尔德斯、美国的特朗普等,这些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大多缺乏传统政治修辞所要求的“好人”特征,他们恰恰多是持“政治不正确”的观点,而且公开地反对和蔑视“政治正确”。比如,他们常常发表有关“纳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的不当言论,他们常常采用“不体面”的语言风格对政治精英或政治对手进行讽刺、谩骂与攻击,甚至在政治话语中充满了没有根据的谎言或谣言。他们虽然是政治精英、亿万富翁、文化名人,却把自己塑造成“普通平民”。比如当特朗普说“努力工作是我获得经济成功的个人方法”时,自己俨然是“美国梦”的化身,却掩盖了他是“拼爹”一族的实质。<sup>②</sup>他经常在推特和脸书上无中生有地中伤政治对手,却斥责批评他的美国主流媒体为“假新闻”。<sup>③</sup>这种违反传统“政治正确”和“政治道德”的人品特征,几乎是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的共同特点。在传统政治修辞中,具有这种人品特征的人,根本不可能得到受众的认可,更不用说得到他们的认同。然而,在新民粹主义政治中,恰恰是具有这种反传统“政治正确”和“政治道德”的政治领袖,赢得了不少追随者的信任,认为他们才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通过这种反“政治正确”和“政治道德”的人品,成功地区别于“体面的”政治精英,即那些“腐败的”“罪恶的”的政治精英,反而衬托出他们才是普通民众所希望的具有“诚实”品格的可信之人。

从理性论据来看,新民粹主义政治修辞从来不是为了“讲道理”或“讲清道理”,只是诉诸人们的“常识”和不证自明的“简单真理”,就能实现政治说服的目的。著名的法国大众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指出:“知道该如何引发群众共鸣的演说家总是会通过调动他们的情绪进行演说,而不是通过向他们讲述道理。”<sup>④</sup>新民粹主义政治修辞正是如此。那些政治领袖不会通过“讲述道理”的方式,而是直接诉诸“常识”和“简单真理”来反对他们口中的“精英”政治。他们常常采取“政治不正确”的方式“提起不该提的”,声称“大家都是这样想的”,诉诸“常识”或“沉默的多数”,以反对“精英”的“政治正确”。<sup>⑤</sup>虽然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多数来源于“精英”,但当他们运用“人民”与“精英”对立的政治话语时,到底“谁是纯洁的人民”,“谁是腐败的精英”,政治领袖是不是“人民的一员”等问题,从来不需要事实与证据来清楚地证明。他们只要“用‘常识’来反对官僚政治、专家治国、代议制度并‘捍卫我们的利益’”,就能与“精英”划清界限,获得追随者的认同。加拿大改革党的曼宁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相信普通人民的常识”,澳大利亚的汉森

① 刘文科:《权力运作中的政治修辞——美国“反恐战争”(2001—2008)》,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0—63页。

②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Demagogue: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rump and Twitter*, pp. 172 - 173.

③ Catherine Happer, Andrew Hoskins, Willian Merrin, *Trump's Media War*,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 35.

④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赵丽慧译:《乌合之众》,中国妇女出版社,2017年,第96页。

⑤ Benjamin Moffitt, *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erformance, Political Style and Representation*, p. 61.



则“赞赏普通公民的智慧”。<sup>①</sup>通过诉诸“常识”政治修辞,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一方面指出反对“常识”的人正是那些“维护特殊利益的”“腐败精英”,另一方面还向人们暗示正是那些“脱离了人民的”“腐败精英”导致了社会问题的产生,从而达到贬低“精英”和说服追随者的目的。<sup>②</sup>同时,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常常运用“不证自明的简单真理”来说服追随者。比如,“人民主权论”“人民的普遍意志”“人民中心论”等政治话语都是“不证自明的简单真理”。当新民粹主义政治修辞运用这些“不证自明的简单真理”时,往往能够获得追随者的认同。相关研究表明,诉诸“简单真理”根本不需要论证,而且当演说者向视自己为志同道合者的一群人发表演说时,利用“简单真理”常常是非常有效的说服策略。<sup>③</sup>简言之,新民粹主义政治修辞不需要理性论据,同样能够达到政治说服的目的。

情绪论据是新民粹主义政治修辞最为重要的论据,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情绪诉求,是区别于传统政治修辞的重要标志。现代政治学家认识到,情绪在影响人们的政治动机和政治参与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情绪诉求是政治家及其政党形成内聚力的核心因素;积极的情绪诉求会形成包容性的内聚力,消极的情绪诉求会形成排外性的内聚力。<sup>④</sup>对于新民粹主义来说,诉诸恐惧、愤怒、仇恨和焦虑等消极性情绪,是政治领袖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以形成排外性内聚力的主要方法。尤其是在充满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和环境危机的全球化时代,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普遍利用普通民众对失业、陌生人(移民)、失去民族自治、丧失传统价值、气候变化的恐惧,对主流政治和腐败的失望甚至厌恶,对贫富差距的愤怒等,<sup>⑤</sup>激起普通民众对“精英”“建制派”“外国人”等“敌人”的仇恨,在普通民众中形成平民主义、本土主义、种族主义等排外性内聚力,并导致欧美社会“焦虑的制度化”。特别是2008年之后,美国的特朗普、英国的法拉奇、法国的勒庞、荷兰的威尔德斯、奥地利的施特拉赫等,都通过消极情绪诉求获得了赫赫名望和政治影响力,并成为西方社会“焦虑制度化”的推动者。他们在欧美社会共同建构起“被迫害焦虑”,把欧美的社会问题归咎于移民和难民,并推动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sup>⑥</sup>比如,威尔德斯在政治演说中反复警告人们防范穆斯林移民的危险,主张禁止《古兰经》,关闭清真寺。<sup>⑦</sup>法拉奇把欧盟视为“欧元的经济监狱”,认为欧盟严重威胁着英国的独立和自由,并宣称“英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大大降低,是来自南欧和东欧太过廉价的劳动力造成的”,在英国形成对欧盟和移民的普遍恐惧,直至英国全民公投实现“脱欧”。<sup>⑧</sup>特朗普则时时刻刻运用“他的语言,他的语调,他的个人行为以及政策,培养政治仇恨”。他对“情感法则”的公然蔑视,在任何时候都会终结任何候选人的选举生涯,但对特朗普来说,以一种“不体面”方式持续表达消极情绪,却能够高歌猛进,最终被选为美国总统。<sup>⑨</sup>可见,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在西方社会普遍传播的消极情绪,使新民粹主义获得了普遍的排外性内聚力,促使新民粹主义在西方社会加速发展。

① Benjamin Moffitt, *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erformance, Political Style and Representation*, p. 44.

②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aul Taggart, Paulina Ochoa Espejo, Pierre Ostigu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pulism*, pp. 34 – 35.

③ Scott F. Aikin, Robert B. Talisse, *Why We Argue (And How We Should): A Guide to Political Disagreement in an Age of Unreas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9, p. 67.

④ Pablo J. Boczkowski, Zizi Papacharissi, *Trump and the Media*, Lond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8, pp. 79 – 80.

⑤ Ruth Wodak, *The Politics of Fear: What Right-wing Populist Discourses Mean*, London: Sage, 2015, p. 3.

⑥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Demagogue: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rump and Twitter*, p. 93.

⑦ Pippa Norris, Ronald Inglehart, *Cultural Back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73.

⑧ Michael Kranert, Geraldine Horan, *Doing Politics: Discursivity, Performativity and Mediation in Political Discourse*, pp. 166 – 167.

⑨ Pablo J. Boczkowski, Zizi Papacharissi, *Trump and the Media*, pp. 80 – 81.

可以说,采用反传统的政治修辞论据,即极端主义、充满偏见和歧视的人品,“常识”和“简单真理”的非理性,以及普遍的消极情绪诉求,正是新民粹主义吸引普通民众注意力,并说服普通民众支持或参与新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独特修辞策略。也正因为如此,新民粹主义的政治话语才能在全球传媒领域风云变幻,深刻影响着世界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sup>①</sup>

## 五、结 语

在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数字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革,使政治传播技术越来越发达。尽管各种政治力量都有机会运用这些政治传播技术,但新民粹主义更能适应后现代政治传播环境,更有意愿充分利用各种非传统的政治传播策略来扩大政治影响力。正是通过有效运用这些非传统的政治传播策略,新民粹主义才得以在西方社会不断泛滥并加速发展,导致本来就问题丛生的西方民族主义实践产生了更加突出和严峻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sup>②</sup>严重冲击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使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sup>③</sup>达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有过的程度。

**Abstract** The neo-populism is a kind of nationalist political trend and movement that rose rapidly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of Europe and America in the mid-1980s and has accelerated its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neo-populism has exerted a grea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nation-state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making itself a major topic of the times in national political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f the neo-populism such as authoritaria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media communication strategy that effectively uses media logic and social media, and anti-traditional political rhetoric strategy, trying to explain how populism has gradually evolved into neo-populism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more deeply understand the basic reasons for the rapid rise and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neo-populism in the West.

(刘文科,副教授,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昆明,650091)

[责任编辑:石茂明]

<sup>①</sup> 徐桂权、陈一鸣:《后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媒介话语分析:拉克劳与墨菲话语理论的传播适用性》,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2期。

<sup>②</sup> 刘泓:《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2019年的实践》,载《人民论坛》,2019年第35期。

<sup>③</sup> 唐慧云:《种族主义与美国政治极化研究》,载《世界民族》,2019年第2期。